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钱学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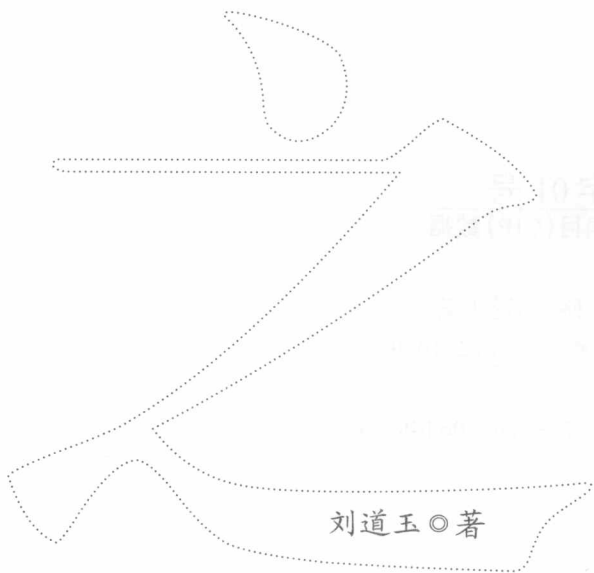
武汉大学前校长
刘道玉◎著

中国

高校之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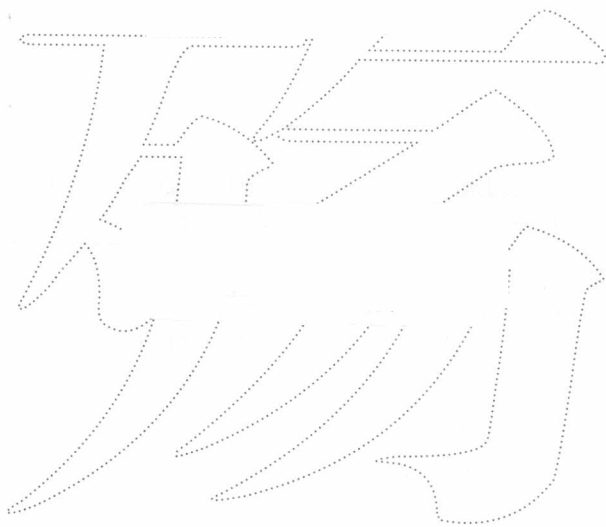
China's college education
老校长刘道玉给中国高等教育开药方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刘道玉◎著

中国高校之殇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高校之殇/刘道玉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0.9

ISBN 978 - 7 - 216 - 06448 - 4

- I. 中…
- II. 刘…
- III. 高等教育—研究—中国
- IV. G649.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27707号

中国高校之殇

刘道玉 著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汉兴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18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插页:1

版次:2010年9月第1版

印次:2010年9月第1次印刷

字数:226千字

定价:25.00元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448 - 4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前 言

自1978年到1988年的十年，是我国近代高等教育最好的时期之一，那时学风纯正，有一批心无旁骛的职业化校长主政，教学质量上乘，培育出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可是，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国高等教育领域里相继出现了乱象，它们是大学合并、大学扩招和建设一流大学的三大运动直接造成的。与此同时，瞎指挥、冒进、浮夸、造假和相互攀比五股歪风也盛极一时。霎时间，昔日令人羡慕的大学，时下成为千夫所指的对象。大学原本是圣洁的地方，是最美丽的神圣事业，现在也变得不美了，甚至是丑陋的了。

我热爱教育甚至胜过自己的生命，我崇尚和立志教育改革，并为之拼搏了大半生。每当我看到这些乱象，或是听到大学生们和社会上的抱怨，我都感到痛心疾首。我虽然不能改变什么，但我可以调查研究和发表评论，剖析产生诸多教育问题的原因，提出改革的建议，尽到一个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正是在这种良心的驱使下，2009年春节期间，我在书房里静静地思考着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问题，激情引发出了我的灵感，一口气写出“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经过反复修改后，我把文稿发给了《南方周末》，请他们审查能否刊用。不料，编辑部很快回复，认为文章针对性很强，既有尖锐的批评又有建设性的措施，决定于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之前刊出，以期引起代表们和社会的关注。2月26日，《南方周

末》31版以整版的篇幅刊出,责任编辑在“整顿”一词之前加了“彻底”二字,并配了扫除假文凭和学术垃圾的大幅漫画。让我始料不及的是,文章刊出后引起了强烈和持久的反响。到2月28日为止,全国有百家网站转载,各地报刊杂志也纷纷全文或摘要转载,评论文章和意见达5000多篇(条)。例如,“为刘道玉先生的檄文叫好”,“支持人民教育家刘道玉”,“教育改革的春雷响了”,“改革高教乱相的妙剂良方”……

出版社的编辑们是极为敏感的,他们随时掌握着读者的心理,及时组编某些深受读者欢迎的书。大概4月中旬,原长江文艺出版社的阳继波先生来访,他谈及到了“彻底整顿高教十意见书”广泛的影响,建议以此文为主,把我近年有关教育评论的文章集结成书,并表示尽快出版。鉴于他的诚意相邀,我同意尽快编出一份目录,并收集了几十篇文稿和访谈稿交给了他。收集文稿对我来说并不难,因为近10年我发表了近200篇文章和访谈,问题是我的文章类别较多,有学术性的,有评论性的,有专访对谈性的,也有随笔的短文。因此,要把这些不同风格的文章构成一个体系,特别是把大块头学术性的文章,根据观点编辑成通俗和可读性的稿子,尚需要花费很大的功夫。继波先生考虑到我年高体弱,不忍我来做这些编辑工作,于是他自愿承担了编辑和修订工作。

实际上,在编辑和修订过程中,工作量之大超过了我的想象。责任编辑没有仅仅停留在编辑和订正的工作上,在编辑过程中还有所创新。例如,在书中相应的地方,他增添了“相关链接”、“扩展阅读”和“名词解释”等内容。这不仅极大的丰富了本书的内容,而且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一切服务于读者的思想,使本书具有较大的可读性、参考性和收藏性。

在本书的编辑过程中,作者与编辑保持着频繁的联系,从书名、目录到每篇资料都作了认真地推敲,体现了作者与编辑严谨求实的作风。最后,我们将这本书书名定为《中国高校之殇》,全书由五个篇章组成,即大学理念之惑,教育体制之弊,校长遴选之误,大

学学术之浮,教育改革之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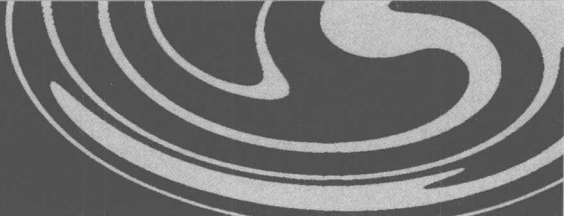
在书名中用了一个“殇”字,这当然是一个形象的比喻,无非是借以强调大学所受到的伤害之严重,我宁愿以“伤”来理解“殇”字,甚至可以说是伤痕累累。高等教育中的问题是怎样造成的呢?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领导决策的失误(如大学合并和扩招),政策的误导(如教育产业化);又有追求“好大狂”思维惯式的影响。更严重的是,国家教育主管部门讳疾忌医,采取闭目塞听的态度,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从更深层的角度看,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问题,在未来二三十年将会更严重,因为三个因素的影响将是长远的。首先是学风坏了,一个好的学风需要几代人培育,一旦好的学风遭到破坏,又将殃及几代人。其次是师资的素质大大地降低了,由不合格的人培育出更不合格的人,形成了恶性循环。三是大学合并的副作用,重犯了1951年院系调整时瞎指挥的错误。大学合并是院系调整的反动,既然1951年的院系调整的副作用多多,那么始于1992年的大学合并运动,也不可能对我国高等教育起到促进作用。那次院系调整后,以苏联的实用主义专业化教育代替了解放前的通识教育,至今已经60年了都扭转不过来。依此推论,我国大学合并所背上的沉重包袱、潜在的矛盾和负面影响,将会是长远的,可能会持续半个世纪之久。

我们集结这本部书的目的是,希望为从事高等教育的领导、教师、大学生以及关心高等教育事业的人士提供一部资料性的参考书。作者也仅仅是抛出一孔之见,见仁见智,各抒己见。不过,作者衷心希望每一个教育工作者,都能够投身到教育改革的行列中来,身先士卒,勇做教育改革的探路人,为理性地捍卫大学精神,使我国大学走出困境而共同努力!

刘道玉

2010年7月7日

于寒宸斋



目 录

前 言	001
第一篇 大学理念之惑	001
中国教育中的“高、大、全”	002
相关链接: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谈高校扩招之祸 ...	013
相关链接:著名学者丁学良历数中国高校问题	016
世界一流大学的建设	025
大学精神的重建	047
80年代的武大精神——《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刘道玉 ...	053
中国高校功能定位刻不容缓	062
重点大学的使命和责任	074
第二篇 教育体制之弊	087
大一统体制阻碍中国高等教育	088
现在大学变成了衙门——《南方人物周刊》专访刘道玉 ...	093
相关链接:华裔数学家丘成桐炮轰中国高校	101
控制与计划不可能振兴教育	107
独立自主:教育体制改革的唯一方向	117
第三篇 校长遴选之误	121
中国应当怎样遴选大学校长	122
怎样领导好一所大学	135
大学校长必须是教育家	152
相关链接:梁文道记述港大老校长高锟	164



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著名的教育家 167

第四篇 大学学术之浮 173

官学不分是学术腐败的病灶 174

高校学风亟待整肃 182

相关链接:易中天谈教授评选 191

我们需要怎样的教学评估 194

相关链接:广西师大教学评估闹剧 200

大学本科该如何培养人才 208

大学应实行创造性教学 226

第五篇 教育改革之难 239

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


——《经济观察报》访谈刘道玉 240

教育改革需要从启蒙开始——《广州日报》访谈刘道玉 ... 253

彻底整顿高等教育的十意见书 260

中国研究生教育必须大力整顿和改革 269

后 记 281



● 第一篇

大学理念之惑

◎近 10 年的大学扩招,最明显不过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高速度、高指标的指导思想。

◎我国大学城是人为建造的,是地方政府与开发商联手促成的,开发商是为了赚钱,而地方政府是为了炫耀政绩。

◎如果说我国现在还没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与其说是办学硬件上的差距,毋宁说是人与软件的落后。

◎办学理念的平庸根源在于办学的领导人不是教育家,他们缺乏创造性,不敢冒改革的风险,行使真正独立自主的办学权。

◎如今,大学已经不是一块神圣的“净土”了,用乱象丛生来形容我国的高校,绝不为过。

◎现在大学里相当多的教师的研究,不是为了个人真正的兴趣,而是为了发表论文、提升职称、申请专利、鉴定成果、转让技术、申请奖励。

中国教育中的“高、大、全”

(一)

乍看起来,“高大全”似乎是一个人名,但它不是人,而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而且似乎已成了一种思维惯式。

所谓惯式思维,就是一种习惯性的思维模式。日本哲学家三本清(1897—1945)在谈到习惯时说:“一般以为习惯是同样行为的反复所造成的。”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是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受着社会形态、群体生活方式、文字、语言等因素的影响。三本清甚至认为,“可以说东方的传统文化是习惯文化。就如习惯是自然一样,东方文化的基础中存在的也是某种自然。”习惯是非纯粹的精神形式,它们是在人们思考和行事的时候表现出来。

一般说来,惯式思维有以下的特点:第一是定势型,即我们常常所说的“脑子不转弯”。这种思维方法是从事发明创造最忌讳的,因为他们总是见怪不怪,把现存的一切都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从不想要去改变它们。持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当面对多种并存复杂的事物时,不注意多种纵向线索之间的互相关系,往往按照自己所需要的那一条线索进行精心处理,而忽视了其他可能性的选择。

第二是趋同型,也即随大流的思维方法。总体上,我国不少人有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毛病,以至于形成了一种保守的思维习

惯。为什么我国经济或教育建设中出现重复建设,为什么我国常常出现“热点”,如下海热、出国热、考研热、从政热……这些都是趋同思维导致的结果。

第三是形而上学型,即只图表面而不注重实质的思维方法。持这种思维方法的人,容易走极端,只求数量而忽视质量,只看形式不注重实质,只图表面不顾内容。其实,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一种省心的懒汉思想,对事物不作具体分析,抹杀事物的个性,用简单化、程式化、固定化的思维看问题,从而抹杀了人们的创造性。

东西方各民族,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如历史进程、科学文化、宗教信仰和民族个性等,他们的思维特点是完全不同的。据我个人的观察与归纳,中国人与欧美人在思维方法上至少有三点不同:中国人“求多不求新,求同不求异,求稳不求变”,而西方人则恰恰相反。也有人说,中国人夸多识,而西方人夸新知,也许这正是我国知识分子缺乏创造性的原因。

为什么“高、大、全”是中国人的一种思维模式?因为自古到今,无论是官员或是老百姓,也无论是商人或是科学研究人员,他们崇尚“高、大、全”,我们只要打开媒体看一看,冠以“高、大、全”或变形的“最、快、多”等词句,简直是满天飞。既然“高、大、全”成了中国人思考问题和行事的出发点和追求的目标,那么事实上也就形成了一种习惯的思维模式。

日本作家中野美代子(1933—)曾经写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人的思维模式》,读后感慨颇多。作为一个日本人,居然通过中国近代小说,分析了中国人的思维模式,我们至少应当感到愧疚,因为至今还没有看到由我国学者写出有一定力度的这类著作。在书中,她罗列了中国人思维上的弱点,如缺少立体思维、缺少好奇心、缺少虚幻思想、缺乏游戏意思、缺乏幽默感等。她毫不隐讳地指出:“历史上所谓的中华‘思想’阻碍了人们对未知世界的认识,这种阻碍渗透到小说中,使周游异国的故事变得无聊乏味。”她进而说道:

“与欧洲人常常为开拓认识世界奔向未知土地而进行的鲁莽旅行及冒险的传统不同，中国人的伦理理念是把认识的疆界限定在五官可及、手足可触摸的领域中……”她的分析不仅说明了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的原因，而且也指出我国国民当今仍然缺少创造性思维的根源。

习惯的力量是巨大的。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曾说：“但是假如个人的单独的习惯其力量是很大的，那么共有的联合的习惯，其力量就更大得多了。”对此，列宁也深有感慨地说：“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是最可怕的势力。”

(二)

在惯式思维模式中，“高”居于首位，它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所起的副作用是非常明显的。我这里所说的“高”，是指在发展高等教育中所表现出来的高速度、高指标、高跨越等，以及在办学过程中为数不少人所追求的“高级”(级别)、“高攀”(高攀名校)、“高峰”(高峰论坛)、“高规格”(建筑和装修)、“高职称”、“高学历”、“高学位”，等等。然而，却偏偏忘记了高质量(教学)、高素质(人才)、高标准(论文)、高难度(科学研究)，而舍弃了这些真正意义上的高标准和严要求，只能导致进行评估弄虚作假和研究生教育的泡沫化。

近十年的大学扩招，最明显不过反映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中高速度、高指标的指导思想。自1999年开始，我国大学开始以超常的速度扩招，当年高校招生160万人，比上一年净增加52万人，增幅速度高达48%，相当于新建了52所万人大学。这是典型的冒进，是1958年教育大跃进在新形式下的翻版。问题是自1999年到2008年的10年中，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发展速度，平均增速为19.2%，头7年的增速为25.3%。与此同时，研究生的招生也急剧增

加,自2000年到2008年,平均增速为23.06%,最高年份增速为46.2%。

据国家教育部网站消息称:“中国高等教育规模超过俄罗斯、印度、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过短短数年的努力,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实现了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走完了其他国家需要三五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道路。”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既没有经过产业革命,又没有现代工业基础,在高等教育基础十分薄弱的情况下,用1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50到100年需要走的道路,这不是冒进又是什么呢?在师资、设备条件很差的条件下,怎样能够保证教育的质量呢?可是,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竟然说,10年扩招没有方向问题,但是政府投入不足严重地制约了教学质量。这绝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育质量严重下降、学风严重浮夸、教学评估弄虚作假,这不是方向问题,那还有什么方向问题呢?

根据我国经济建设的需要,不是不可以适当扩大招生的规模,但必须与经济发展的速度和市场对人才的需要相适应。可是,我国在扩大招生问题上,既违反了经济的规律又违反教育发展的规律。在具体执行扩招时,又犯了一刀切的错误,重点大学本是肩负提高的任务,完全不应该扩招,但也下达高指标的扩招计划,以至于造成了师资、设备、图书馆、宿舍、运动场所等严重紧张的局面。

为什么历时10年的扩招运动能够得以顺利地推行呢?除了跟风同向思维以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受自身的利益所驱使,因为扩招会给大学带来数千万甚至数亿元的学费收入。

据我所知,全国只有中国科技大学例外,该校10年不扩招,每年招生的数字是1860人,它被认为是一个恒数。在全国大合并、大扩招和搞大而全之风盛行的情况下,中国科技大学是个另类,他们不跟风、不合并、不扩招,“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保持自己的办学特色,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有了这种独立精神,还愁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和做出创造性的成果吗?

(三)

阿尔温·托夫勒(Alvin Toffler, 1928—)是美国著名未来学家,他在《第三次浪潮》中对“好大狂”的思维模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说:“第二次浪潮文明的‘好大狂’也受到了攻击。‘大就是好’的鼓吹者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受到‘小就是漂亮’鼓吹者的非难。只是到了70年代,一本《小就是漂亮》为题的书,才在全世界范围内成为极有影响的畅销书。”

随着新的技术革命的深入,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转变,树立了“小就是好”的生产、消费理念和审美观点,而抛弃了“好大狂”的思维方法。可是,我国虽然初步实现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大多数人的观念仍然停留在工业文明初期阶段,抱着“大就是好”的老观念不放。从历史上看,中国人对“大”情有独钟,它几乎渗透到一切领域里。例如,讲朝代要加上“大汉”、“大唐”、“大宋”、“大明”、“大清”;街道要命名为大街、大道;楼房要叫“大厦”、“大楼”;破旧立新要叫“大破大立”;整风运动叫“大鸣大放”;形容有智慧的人叫“大智大勇”;结婚叫“大婚”,出自传叫“大传”;有关“大开发、大跨越、大发展”的标题,在各种媒体上屡见不鲜。建设现代化的城市,也是高喊“大上海”、“大武汉”、“大西北”、“大都市”。1990年提出了国际化,于是就有47个城市要建国际化的大都市。这是明显的浮夸,西方发达国家一般也只要一两个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国怎么可能建成这么多的国际化的大都市呢?近年大兴“论坛”和“讲坛”之风,但觉得不过瘾,又纷纷推出了各种“高峰论坛”、“百家大讲坛”、“世纪大讲坛”、“和谐社会发展大讲坛”、“健康大讲坛”、“长江美联大讲坛”等。甚至连月饼、保健品包装盒越来越大,书刊的开本也越来越大,街心花园和草坪也越来越大。每思及此,我都感到心痛,国人的这种思维方法是多么的不合时宜呀!

同样地,我国在发展高等教育上“好大狂”的思想表现得尤为突出。自1992年开始的大学改名、升格和合并浪潮,就是“好大狂”典型的表现。据统计,自1992年到2000年,历时8年进行大学的大调整、大合并,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60多个部委参与了这次合并运动,全国900多所大学受到这次浪潮的冲击。大学合并始于1992年,把江西大学和江西工业大学合并为南昌大学,目的是要挤进“211工程”,打造全国的名校。接着,1998年把浙江农业大学、浙江医科大学、杭州大学与浙江大学合并,从而掀起了全国大学合并的浪潮,2000年达到了高潮。当时,似乎已经造成了一种舆论:“合并则兴,不合并则亡”,由各部委和各省政府出面,强行进行合并,甚至搞“拉郎配”式的合并。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高校大合并的指导思想是值得怀疑的。指导思想之一是所谓的实现“强强”联合,这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很多被合并的大学并不是重点大学,甚至把一些专科学校和干部管理学院合并进来,这怎么是“强强”联合呢?相反地,真正的重点大学并没有实现合并,所以很显然合并的指导思想强调的是“大”,而并非是“强”。

合并指导思想之二是建设一流的研究型的大学,这也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学校的规模没有线性关系。大并不意味着强,这是人所共知的浅显道理,为什么国家主管教育的领导人就不明白呢?问题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真正的强,而是“好大狂”。

指导思想之三是中国大学多了,不便管理,所以需要调整、合并,这也是与事实不符的。真的中国大学多了吗?结论是否定的。美国只有2.81亿人,有3500所大学,而13亿人口的中国只有1900所大学,怎么能说我国大学多了呢?到底是分散超大型大学好管理拟或是小型大学好管理,道理也是很明显的,这只不过是强词夺理而已。

我们不妨看一看几个具体的例子。例如,吉林大学是由原吉林大学、吉林工业大学、白求恩医科大学、长春科技大学、长春邮电学院、解放军军需大学等6所大学合并的,合并后的吉林大学分散在6个校区、9个校园,占地661万平方米,在校学生7万多人,堪为全国第一。白求恩医科大学是一所既有特色又有纪念意义的大学,为什么把她取消?当地群众讽刺地说,要找长春市就到美丽的吉林大学校园里去找。更为荒唐的是在遥远的珠海,建立一个分校,占地居然达到330万平方米,这到底是办教育还是搞创收?合并后的吉林大学,水平和效益到底是提高呢抑或是降低了呢?事实胜于雄辩,除了规模居全国第一以外,剩下的恐怕就是30亿的高额债务了。

另一个例子是贵州大学,她是经过几次合并,最后由6所大专学校合并的,其中专科和干部管理培训机构就占了4所。合并后的贵州大学,有24个学院、101个专业,在校本科生为45000多人,研究生3030人,一下子进入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之列。据说,合并后顺利地进入了“211工程”,如果不合并就进不了。这是典型的拉郎配,是纯粹“好大狂”的表现,明显的是以功利主义推动大学的合并。

对于这场大学改名与合并,舆论纷纷,反对者亦众。但是,当政者置群众的舆论于不顾,完全由上而下,由长官意志拍板决定。为了指导大学的改名与合并,国家教育部制定了大学改名的7个必备条件,规定学生在8000人以上,正教授在100人以上,硕士点需要10个以上,必须具备3大门类学科,等等。正是在这种“求大”的指导原则下,掀起了大学改名的浪潮,并导致了全国范围内各大学求大、求多的风气。

目前,专科学校都改成学院,而学院统统改成大学了,而大学的名称是一改再改。纵观这场改名与合并的浪潮,反映出了“求大”的普遍规律:一是地名越改越大,如由城市、省名、大区(如华东、中南、

西南等)直到冠以“中国”才罢休;二是学科内容涵盖越广越好,如原来的工学院改为理工大学,后又改为科技大学;三是原来的化工、煤矿、石油等学院,也都改成“工程大学”了。

随着大学的改名,大学中的系也水涨船高,统统地升格为学院了,如数学——数学与统计学院,物理——物理与技术学院,化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环境科学系——环境资源学院、中文系——文学院,历史系——历史学院(也有改为旅游学院)、经济系——经济与管理学院、图书馆学系——信息情报学院、政治学系——行政公共关系学院、哲学系——哲学学院、新闻系——新闻与传播学院……不一而足。

这场轰轰烈烈的大学改名与合并远动,是世界从没有的先例,完全是违背科学和教育规律的。如果按照中国教育官员的逻辑,那么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威廉·玛丽学院和法国的巴黎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巴黎高等工业专科学校、巴黎行政管理学校等,早就应该改名了,但他们却坚持不改名。可是,这些学校,有的是拥有“媒体实验室”的发明创造的摇篮,有的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的大户,有的却囊括了世界最多的菲尔兹奖(7人),有的培养了多名总统。然而,即使中国拥有再多的“航母型”的大学,与包括上述那些大学在内的世界著名大学相比,也是难以望其项背的。从与国外大学办学思想的对比看出,中国人的形而上学思维方法是多么的严重,“好大狂”的思想又是何等的狂热啊!

在大学合并的同时,国内又掀起了一股“人为造城”的运动。自1999年北京外企投资建设廊坊东方大学城奠基开始,又拉开了大建大学城运动的序幕。据不完全统计,到2003年12月,全国已建成和正在建设的大学城共有54座,占用耕地1646万亩,占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的65.6%。这股人为的“造城运动”有以下三个特点:

第一,相互攀比,规模越来越大。最初,上海松江大学城只有几平方公里,可是后来大学城的规模越来越大,如广州大学城一期工